

如今,红树林是“海岸线最牢固堤坝”的意识已开始广为人知,红树林保护区在全国越来越多,人工成功恢复红树林的技术也越来越成熟。

可是,仅仅在三四十年前,红树林的待遇却是天差地远,人们常常把粮食增产的热切目光投射在这些海边连片的葱绿上。“文革”末期,在海南三江农场土地上就曾发生一起围垦万亩红树林造田的事件。数十年后的今天,当人们试图拂去历史的尘埃,追溯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时,依然难免扼腕痛惜。

国营三江农场围垦工程示意图



石梁均画

围垦今昔30年

今年三四月间,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三江农场当年围垦造田的地方时,惊奇的发现,在三江农场当年围垦设想中的“良田”已经大部分变成了鱼塘、虾塘,几乎每一棵椰子树都已经秃顶。“那是盐碱和酸化闹的。”黄循平痛心地说。

按照原定计划,围海造田工程完成后,剩下的工作就是将原本高盐碱含量的土质经过数年的淡化,利用红树林下原有的大量腐殖土层,将围垦土地变成大片水稻良田。

“甘蔗被列为围垦初期改良土壤的首选植物。”现任三江农场党委书记兼场长黄镇回忆说,当时人们认为甘蔗具有耐咸省水省工的特点。

围垦造田结束后留下来的桂林洋、罗豆、三江等3个农场的800多位干部职工开始在新开田洋进行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试验。老家在文昌罗豆的58岁的符永喜就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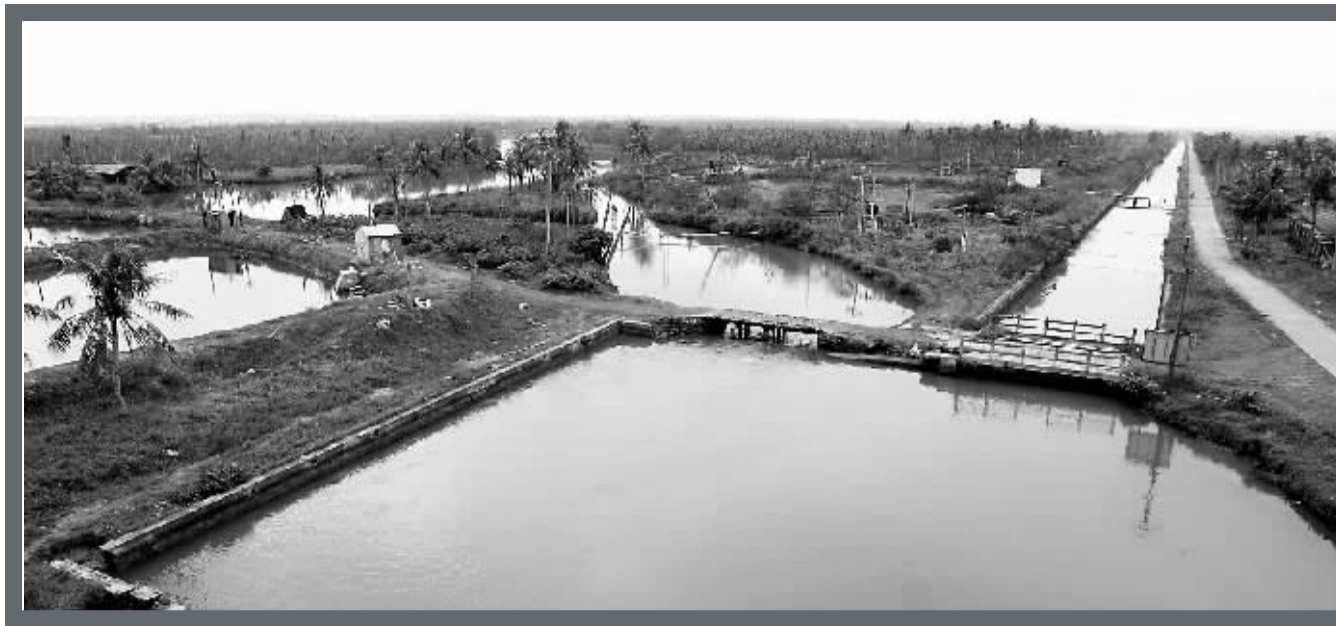
符永喜回忆,1977年至1990年间,新田洋先后种植过甘蔗、水稻、高粱、玉米、香蕉、咖啡、益智、椰子、菠萝、黄麻等20多种植物,还放养过泥蚶、鱼虾、江篱菜等。或因土壤碱性大,不能生长;或因缺少防风林,遭台风袭击难以生长。到1990年为止,种植成功的仅有椰子、黄麻、甘蔗等少数几种作物。

其中,值得一提的有新田洋种了七八千亩椰子,号称“万亩椰林”,三江人自称是世界第二大椰子林。“椰子长的不错”,符永喜说。但到了1994年,海南养殖鱼虾风潮中,三江农场决定大面积开挖虾塘,改变农场人不敷出的经济窘境。万亩椰林最终成为了万亩虾塘鱼塘,椰树成为了其中的点缀。慢慢地,这些残留的椰树出现了其他地方少见的秃顶现象,大面积死亡。

对于椰树的秃顶,有一种说法是挖虾塘导致的海水倒灌,让椰树的生存环境恶化。但对这种说法也有异议,理由是其他很多地方也挖虾塘,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应该是围垦出来的土地本身的原因。

三江农场场长助理林师认为,市场经济最终让三江围垦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阶段性发展方向。如今海淡水养殖已经成为三江农场的主要特色产业,已有海淡水养殖1.6万亩,是垦区最大的水产养殖基地。在养殖模式上已形成对虾养殖、罗非鱼养殖、鱼虾混养、鱼鸭混养等多样化格局。

(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实习生赖巧英)



万亩红树林消失始末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单憬岗 实习生 赖巧英 通讯员 陈飞 戴有焕

文革末期,在海南三江农场土地上曾发生一起围垦万亩红树林造田的事件。追溯1970年代的这一历史事件,必须从海南农垦设立谷物农场说起。

农垦缺粮时期 猪都瘦得赛狗

海南农垦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撑起了中国橡胶产业半边天。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缺粮,曾是广东农垦总局(1988年以前辖海南农垦)成立后长时间挥之不去的阴影。

农场退休干部梁英才回忆说,在农垦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吃的是“高产饭”——先把米用水浸透,然后加上南瓜一起放到陶盅里蒸,每盅的米只有一点点,这样煮出的饭比用通常的方法煮要多好几倍,但淡而无味,缺乏营养。有时连这样的饭也难吃上了,常常用以裹腹的是两种东西:将淀粉厂生产淀粉后余下的木薯渣制成饼;上山挖黄狗头,与蕉树头砍碎了加工成饼和糕。

当时国家粮食极其短缺,无法筹供农垦新增人员的商品粮。曾任澄迈金安农场党委秘书的广东知青何蔡亮回忆,1960年代中央对农垦商品粮供给问题作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调整:在不改变农垦商品粮性质的前提下,中央以现供的商品粮指标为基数对农垦实行商品粮大包干,农垦新增人员国家不再增拨商品粮,允许非粮垦区自产粮食补缺。

对此,三江农场原场长王禄瑶解释得很透彻:“这叫吃包干粮,政府给农垦定了职工后,按人头发粮,你饱不饱,自己想办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海南农垦先后成立了6个谷物农场,其中就包括三江农场。

王禄瑶说,三江农场1965年刚成立时,粮食亩产不到300斤,到1975年已达700多斤。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比起橡胶农场来,当年的谷物农场可是香饽饽,好多农垦的职工都想要调到6个谷物农场去。

即便如此,随着橡胶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逐渐增加,缺粮仍然是海南农垦必须面对的首要难题。三江农场宣传科戴科长回忆说,到了1970年代,依然是任何农场的粮食都不够吃。“当时农场1个月只杀1头猪,那个猪是公家养的,可因为缺乏粮食喂养,这些猪都瘦得赛狗。”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有了三江农场的围海造田。

仓促拍板 万亩红树林命运突变

1975年冬天,三位广东农垦总局和海南农垦局领导的到来,让三江农场演洲河下游的万亩红树林的命运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哪一天我说不上来,反正是11月份,稻子割完了。”当时,王禄瑶任三江农场场长。一天上午,大雨倾盆,时任广东农垦总局主要负责人在广东和海南两级农垦局各一位负责人的陪同下,专程赶赴三江农场考察围垦事宜。

在王禄瑶的带领下,大家一起坐着北京吉普,在泥泞的道路上一路颠簸来到红树林边。雨下得很大,大家都没有下车。车窗外,红树林被雨水捶打得枝叶乱颤。该主要负责人指着窗外广袤的大片绿色,盯着王禄瑶:“想不想围?”

“我想围,没有力量。”

“什么时候能腾出力量来?”

“这几年都拿不出来劳动力。”

“为什么拿不出劳动力?”

“我的基本农田改造还没有搞完,要集中力量搞基本农田。我

想快点搞,就是没有力量啊。”

“今年搞!”前有橡胶任务压力、后有缺粮重担的广东农垦总局主要负责人,斩钉截铁地回头对海南农垦局负责人说,“海南局组织力量来搞。”

就这样,几个问题问完,万亩红树林的命运就被确定了。据王禄瑶回忆,这其实是该主要负责人第一次到三江农场。

很快,王禄瑶受命在1个星期内搞出了围垦的初步规划和地图。在规划里,围垦区总面积23300亩,共分两期,第一垦区位于演洲河左岸,面积11000亩左右,争取在1975年冬到1976年春天完成;第二垦区位于演洲河右岸,面积11000亩,争取在“五五计划”(1976-1980)内完成。

工程很快于当年11月24日即获得广东农垦总局的批复。批复文件上进一步要求:一期工程务必于翌年春天完成,二期工程也应“组织力量打歼灭战”,争取1978年以前全面完成。

在海南农垦局1975年的《关于国营三江农场围海造田工程的报告》上有如此描述,三江围垦将“当年受益,经济效果显著”,“土壤淡化后,种植水稻,以年亩产两千斤计,每年的粮食产量可达1600万斤。”

“高效率”的万人大会战

在1975年冬至1976年冬之间的两次冬春时节,两次“万人大会战”让三江农场霎时间变得热闹喧嚣。

1975年12月1日,即海南农垦局拿到广东农垦总局11月26日发出的批复后5天,第一垦区首期工程即告正式动工,工程总指挥是原海南农垦局副局长。三江农场原副场长黄循平认为,从决策到动工如此高效率,以及工程指挥部的高规格,足以说明当时粮食紧缺的紧迫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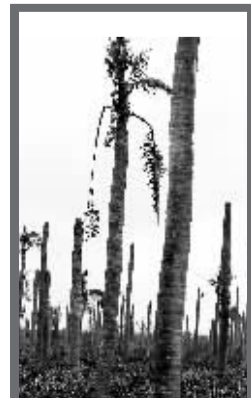
《三江农场志》记载,第一垦区整个工程分为两期进行。第一期围垦工程,主要是修建主堤工程。抽调琼山、文昌、琼海、万宁、定安等县23个农场的9000多名工人参加。到1976年2月20日为止,施工时间共43天。共完成主堤工程6982米,修路6.5公里,堵河18条,架桥22座。大部队撤走后,工地仍然保留了一个近千人的专业队伍继续施工。

第二期围垦工程。围堤工程完成后,1976年冬,海南农垦局党的核心小组又组织造田大会战。海南岛汉区9个县25个农场7000多名职工参加了,其中大部分为知青。经过50天的艰苦奋战,共挖修排灌渠道42.1公里,修公路42.1公里,堵河59条。

“当年的围垦条件十分恶劣。”黄循平介绍说,尤其是1976年冬天,是海南有气象资料以来最冷的一年,天寒地冻,潮水侵袭,加上缺乏经验,时间紧迫,技术力量奇缺,机械设备稀少,工程难度很大,施工十分艰苦。“千难万难何所惧,誓叫海滩变良田”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近万名围垦干部群众在火一般的革命热情鼓舞下,抗严寒、战风雨,堵河开渠,挖树头、清淤泥,平整造田。

在火一般的热情中,第一垦区1.1万亩红树林彻底消失,出现在眼前的是寄托无数人热望的8300亩新田洋。然而,这近万亩田地,在后来的十几年间,带给人们的是远大于希望的失望。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更因为文革被终结,第二垦区的围垦计划没有被列入议事日程,另外11000亩红树林才幸免于难。



三江湾围海造田曾经改种万亩椰林。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盐碱度过高,椰林大面积死亡。

一九七〇年代,海南三江农场围垦万亩红树林项目仓促上马,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如今当年围垦的田地已被鱼塘、虾塘等所取代。

本版图片均由海南日报记者 苏晓杰摄